

87072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2

1995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2

1995

现代文学研究十五年专号(下)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版式设计：吕 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九五年 第二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8号

邮编：100081

*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13千字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650册

ISSN 1003—0263

刊号：

CN 11—2589/I

定价：9.0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995年第2期(总第63期)

目 录

鲁迅研究的传统与当代发展	高远东(1)
近年来青年鲁迅研究学者的研究趋向	朱晓进(7)
郭沫若文学研究十五年	魏 建(20)
茅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叶子铭 丁 帆(36)
结束与开端:	
巴金研究的跨世纪意义	陈思和(54)
开创“老舍世界”诠释	
与研究的新局面	吴小美 古世仓 李 阳(68)
曹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袁国兴(93)
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凌 宇(110)
艾青研究十五年	陆耀东(136)
丁玲研究述评	陆文采(152)
十五年来赵树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董大中(167)
学科的尴尬与学者的自觉	杨 义(180)
我们的学科:	
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	樊 骏(192)
学会十五年工作的回顾	钱理群(231)

·短 论·

印度文学对郭沫若思想的影响	周 红(237)
试论丁西林剧作的唯美倾向	孔庆东(244)
理想人格追求中的生命形态 ——论林语堂小说创作的人物构成	阎开振(252)
穆旦诗《五月》分析兼论穆旦诗思	冯金红(263)
编后记	(271)

CHINA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SERIES

No.2,1995.(Total 63)

〔I〕

CONTENTS

Lu Xun Research's Tradi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Gao Yuandong

Recent Lu Xun Research's

Trend in The Young ResearchersZhu Xiaojin

About Guo Moruo Research in The 15 YearsWei Ji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o Mao Dun ResearchVe Ziming

Ding Fan

An End and A Beginning

Ba Jin Research's Meaning Across The CenturyChen Sihe

Create A New Situation to Interpret and

Research/Lao She's World" ...Wu Xiaomei,Gu Shicang,Li Yang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o Cao Yu ResearchYuan Guoxing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o Shen Congwen Research.....Ling Yu

About Ai Qing Research in The 15 YearsLu Yaodong

Review Ding Ling ResearchLu wencai

Retrospect to Zhao Shuli Research in

The 15 Years and A ProspectDong Dazhong

A Dilemma of Science and A consciousness of Scholar ...Yang Yi

Our Field It's Getting Towards Maturity

Instead of ImmaturityFan Jun

Retrospect The Association's Work in The 15 Years ...Oian Liquan

SHORT REVIEWS

India Literature's Effect to Guo Moruo's ThoughtZhou Hong

Inquire on The Aestheticism Tendency in

Ding Xilin's Creations	Kong Qingdong
Review The Character's Construction in	
Lin Yutang's fictions	Yan Kaizien
An Anafysis of MAY and Mu Dan's	
Thinking of poetry	Feng Jinhong

鲁迅研究的传统与当代发展

高远东

作为一门“显学”，鲁迅研究集中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双重品格——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它有两种路数、两个方向：其一，强调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作为“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伟大经典”而存在、而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内在运动尤其是与中国革命保持血肉联系的特征，以完成、深化和修正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为指归，热衷于发现和建立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与当代生活和当代思想之间的联系，带有较明显的“创造性阐释”的品格。研究者往往以鲁迅的“门人”和同志自居，不乏“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倾向，事实上是把鲁迅研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积极建设来做的，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的生命力——参与历史进程和影响当代生活的能力——往往靠它来形成和延续。这种研究路数和方向经由瞿秋白、毛泽东、周扬等人的“圣化”工作一度在当代文化生活中蔚为大观，在学术领域曾被普遍采用。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与不同意识形态使命承担之间存在矛盾，过于强烈的权宜和策略性改造反而会导致研究客体的主体化，使鲁迅研究失落其作为客体的存在，因着重当代性而丧失历史性，陷入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其二，强调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事实与研究工作所受学科自身的学术规范的制约，自觉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学术著作中直接汲取营养，重在以知识的精神进行认识而非企图付诸实践，突出判断尺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非主

观的、党派或学派需求的意识形态价值，强调保持主体与客体的距离而非主体向客体的投入。他们的研究不是“朝圣”，正如鲁迅本人的治中国小说史和称道王国维^①，而是在保持研究距离和审慎的理性中宏扬着人类普遍的学术精神。他们健全着鲁迅研究的学术规范，尽可能地为鲁迅研究奠定一个科学的或学科的基础。这种研究路数的不足则在于对鲁迅的问题和关怀缺乏足够的回应。这两种既联系又区别的研究取向共同地构成了鲁迅研究的传统，其消长起伏决定着现代中国70年来不同社会、文化、文学思潮同步感应的鲁迅研究的“偏至”特征和基本风貌。包括新时期鲁迅研究在内的近70年的研究史正是在完成意识形态使命和满足科学性要求的张力场中形成其相互渗透、相互对话、相互竞争、相互适应的格局的。这是一份有得有失、有喜有忧的遗产。

我把一部分鲁迅研究工作说成建立某种意识形态，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含有贬义。这不仅由于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本身能够给予支持，而且正由于它，鲁迅研究才成为鲁迅事业的组成部分，才成为一种有成有败的实践。所谓理论的活力、与当代生活的对话性联系以及前一时人们因无法充分参与当代思想与文化的“弄潮”而产生的焦灼等内容都受它的制约和由它赋予。鲁迅之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一面旗帜，也在于它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问题纠结的程度与那种奋然前行的新文化意识形态形象。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起作用。”^②意识形态与科学不同，它把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置于理论的或认识的职能之上，既是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也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它并非只在党派的、阶级的理论中存在，而且几乎所有热衷于参与历史进程的主体意志、价值、利益的理论之无意识体现。比如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源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现代中国思想、道德、语言、文化和

文学的基本问题，规划了未来社会、文化发展的宏伟蓝图，决定了达到其启蒙主义目的的各有千秋的手段，也制造了现代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民主”和“科学”。我们今天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仍无法挣脱这种“五四”情结，包括宏扬鲁迅精神、敢于直面特定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对于鲁迅研究的侵蚀的独立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内，其所坚持的工作实质上依然是一种鲁迅式的或者“五四”式的意识形态建造。应该说，重在改造世界的这部分鲁迅研究传统虽然有太多的教训，但其基本取向却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它的短长深植于中国历史的内在运动之中，与中国的传统和现代的思想和文化结构都有深刻的纠结。所以要深化和拓展鲁迅研究，继续解答由鲁迅提出但并未完全解答的问题，重建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与当代文化生活之间的联系，最终建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或文化意识形态，恐怕倒是未来鲁迅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刻变革、思想和学术日益从社会话语中心向边缘的位移及不可阻止的专业化趋向，学术研究失落植根于“五四”的现代人文精神——对民族、社会、人的和谐发展的整体性关注——将是可预料的现实。从这一趋势来看，对于鲁迅研究的这部分传统的优劣评骘，或许只有当研究者饱尝专业化的“铁屋子”窒息之苦时才可能具备判断的知觉：这是鲁迅研究的优秀传统，可以反省、修正，却无须全盘否定或抛弃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独立思想品格和学术主体性的真正确立，而这正是鲁迅等“五四”启蒙主义实现得不尽如人意的目标之一。

不过，对于今天的鲁迅研究，作为其传统的另一方面——科学性和学科意志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科学与意识形态有交叉、重合，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质。由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⑤对于鲁迅研究，这就等于说，当人们认知鲁迅的思想和作品这个客体时，在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两种不

同的关系：一种是真实的关系，属于科学认识的对象；一种是“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属于意识形态关注的对象。在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要把真实的关系包括进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中去，被主体化，从而部分丧失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即有与科学相对立的含义。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把马克思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科学立场规定为“科学（科学是对现实的认识）就其含义而言是同意识形态的决裂”，“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对象”。^④倘若说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主潮之一的“体验式”地即主体投入式地研究鲁迅的方法经由（借用胡风的话）一个“相生相克”的过程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其主观性，而与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普遍生存经验的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保持契合而不失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主观的和人本的真实的话，那么“想象式”地研究鲁迅的实用主义方法则以丧失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为代价，因为它一开始就几乎不受研究客体的制约，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仅仅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想象”的具体实现。建国以后长期存在的用政治意识形态作为鲁迅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和评价尺度、以意识形态的结构而不是以鲁迅自身的思想和精神结构来建造研究模式——鲁迅的思想、作品、人生道路无不隐寓着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趋向，鲁迅研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及共产主义革命的论证和提供根据。这样一种研究虽不失历史的合理性，但在不受研究客体制约的思想方法上却是主观的和“想象式”的，作为研究客体的鲁迅的属性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剪裁、被肢解，尤其在诸如：“文化大革命”之类历史时期，鲁迅的著作以像毛泽东选集一样被肢解成“语录”的形式极端地表现了主观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和深远作用：不但遭受肢解的材料可以根据不同需要任意组织，而且当组织这些材料的权威理论同时赋予这种或横眉或峨眉的“鲁迅”形象以权威性时，鲁迅研究便完全丧失了主体的学科意志，它的意识

形态本质压倒了科学本质——弥漫于“圣坛”的宗教性想象，正是新时期伊始鲁迅研究以清明的理性之光大力驱除的幽灵。

那么，在鲁迅研究中，除了强调科学性和学科意志的研究取向，实际上还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化的取向：一种强调忠实于鲁迅研究本体的真实内容，不回避和不篡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中固有的或不合公众认识的矛盾，力图通过身体力行的“体验”和还原鲁迅的问题而接近当代文化生活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鲁迅研究与当代生活的对话性联系；一种则服膺于某种理论原则，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仅仅作为时代意识形态的论据或注释而存在，所谓学术研究只是寻找鲁迅与某种理论原则或（个性主义、启蒙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的）教条之间的联系。这两种路数也是两种分歧，既关涉思想方法，也关涉学术主体性的确立与否。正是在这种背景上，王富仁提出“回到鲁迅那里”的口号和钱理群提出的从鲁迅自己惯用的、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观念、意象入手考察其思想和作品的丰富性、独特性的方法应该得到足够的肯定。我以为，它们首先意味着在多元的文化选择中确立鲁迅的独特性并持续地关注鲁迅提出的问题的努力；其次意味着一种主观诚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极具操作性的方法；第三，无论对于重建鲁迅式的意识形态，还是确立学科规范，它们都构成了对鲁迅研究中主观教条主义和客观唯意识形态传统的消解，便于为即使旨在重建鲁迅与当代文化生活的对话关系的意识形态化的鲁迅研究奠定一个真正科学的基础。

其实，作为一种人文研究，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纯粹的“科学性”在鲁迅研究中并不存在，之所以强调鲁迅研究的科学治学精神，主要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抑制研究中的主观教条主义与把意识形态和科学混为一谈的糊涂认识，同时对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取向的负作用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从80年代的辉煌转向90年代的审慎和持重，一种更加务实的、淡化意识形态的研究取向进入并

深入学术实践，有助于鲁迅研究获得一个更加科学的学科形态，这是与鲁迅研究日益“古典化”的进程相联系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文研究正处于一个新的话语转型的时期，新的思路 and 理论工具的引进不可避免地使鲁迅研究成为一个试验场，也不可避免地对既有的鲁迅研究形成一种吉凶未卜的冲击。比如80年代后期引进的美国詹姆逊的“第三世界理论”，把鲁迅的小说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对抗第一世界的民族文化的文本——一种“民族寓言”来理解，它携带着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现代性的反思相纠结，从思路、语汇、命题都令人感到陌生和挑战。尽管他把鲁迅作为民族主义的文化代言人理解不合事实^⑤，但对于“现代”的观照至少在历史外延上是发展了，我们在理解“现代”及“现代性”问题时就具有了两个不同的座标：一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前倾，一是从后现代向现代的回顾。在后现代思潮的座标中，迄今为止的鲁迅研究的定位似乎都要受到它的质疑。那么，对于这种新的泛意识形态研究，鲁迅研究惟有贴近自己的历史的、道德的、问题的基础，依靠严谨、坚实、富于创造性的科学思考，才能真正进行高质量的学术建设，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1994年5月

注释：

① 《热风·不懂的音译》中鲁迅谈及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②③ 路易·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见《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1页，第203页。

④ 同上，《论青年马克思》，《保卫马克思》第58页。

⑤ 参见拙文《经典的意义——鲁迅及其小说兼及弗·詹姆逊对鲁迅的理解》，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4年第8期。

近年来青年鲁迅研究学者的研究趋向

朱晓进

鲁迅研究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和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为标志，可谓是鲁研的鼎盛时期。在那个时期，不断有新的命题被提出，在方法、视角、观点上不断有新的突破，不断有新的热点出现，不时有轰动效应产生。相比之下，80年代末到目前的几年内，鲁研界相对沉静。但这种沉静并不意味着学科发展的停滞，相反，前一阶段提出的许多命题，在这一阶段得以充分展开，许多前一阶段提出而并未解决的疑点难点，有许多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合理的解答，一些新的方法的尝试也更为扎实。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批青年学者，尽管从总体上来看，他们的研究成就不如上一辈人那么突出，但在他们身上却显示了一种研究的潜力。近些年来，鲁迅研究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方面之一，其鲁研成果面广量大，要在短时间内对之作全面概述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将范围缩小到《鲁研月刊》上面，当然，这也是因为《鲁研月刊》是鲁研界的核心杂志，是坚持得最久也最有份量的。尤其是它在养成青年鲁研学者队伍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近几年来稍稍活跃、稍有成就的鲁研学者中的多数，基本上都是从《鲁研月刊》上起步的。

—

在这批青年学者那里，大都具有一种注重文本的自觉追求。

在他们的文章中，“文本”这个词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所谓注重文本，就是注重从对作品本身的分析入手，从作品本身找寻支持自己对作品进行价值评判的依据。例如高远东在《〈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①一文中认为，以往对《祝福》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多涉及《祝福》的政治层面，即“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著名结论来涵盖”，“而更深层的文化批判亦即对以儒道释为主体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否定的内容，却不幸被忽略了”。在高远东看来，不注重文本分析，正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会出现以现成结论来评判作品而忽略作品自身更为深刻的内容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要从文本出发，找寻“能够支持其判断的东西。”文章着重对文本中所展示的“鲁镇文化”的不同层次作了精到的分析，通过对鲁镇风俗层面、鲁镇文人特征的层面，鲁镇内部人际关系层面等等方面的分析，有力地揭示了鲁镇文化的“三教合一”的混沌性质，从而得出结论，作为《呐喊》集中第一篇的《狂人日记》，“对传统文化‘吃人’的指控只限于儒家（礼教）而稍显单薄、直露”，而作为《彷徨》集中第一篇的《祝福》“对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批判则扩展到了儒道释三家”，鲁迅正是通过祥林嫂的“被吃”这个“寓言式故事”，“彻底否定了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这也表明了鲁迅的文化批判的深入，即从五四初期的“激情的呐喊变得更为深沉和富于理性”，文化批判的矛头也从儒家思想单一的文化范式转向更为广阔的方面。

注重对文本的解读，善于从文本的不同层面来加以剖析，是这些批青年学者们的一个显著特点。紧紧抓住文本的不同层面所提供的东西，这是文本分析的一个重要方式。尤其是鲁迅的创作，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他常常是“所说”非“所想”，而“所想”却未必直接“说出”，因而，在对文本的解读中，不仅要注意到文本的文字层面，读解出作品中直接明示的意思，还要力图读出隐含在文字层面后面的隐寓意义。正因为如此，在这批青年学者的鲁研文

章中，常能见到“寓言”这个词汇。所谓“寓言”按他们解释是“指一种独特的意识结构”，“是明晰的直接意识的产物，其意义经过理性的澄清，既丰富又确定。”谢伟民的《悲剧？喜剧？悲喜剧？——重读〈阿Q正传〉》^②一文，即指出“鲁迅实际上通过阿Q的故事，叙述了一个人与环境关系的文化寓言”。文章着重对“阿Q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生代表置于个体生命与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的冲突之中”这一角度作了分析，认为有关阿Q的“这样一个关于人类普遍处境的故事，它的文化象征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了民族文化内涵”。这种解释，起码从一个侧面在试图解答这样一个以往《阿Q正传》研究中的疑问：既然阿Q性格是国人灵魂、民族病态的写照，那么何以解释许多其它国度和民族的读者也能从《阿Q正传》中读出自己本民族国民精神的影子？薛毅在《论〈故事新编〉的寓言性》^③一文中，也是特别地强调了《故事新编》的寓言性，全文主要的努力都是放在透过故事结构去昭示这种“寓言”的实指内容。文章认为，《故事新编》是处于传统末日时代的鲁迅对文明起源的先秦时代诸种精神的重新审视，“鲁迅作为传统末日的目击者和思想者，既不可能将起源精神全部作为‘坏种的祖坟’刨掉，也不可能陶醉在起源精神的非凡能力的想象之中。起源与末日之间，既有最明显的异质性，又能产生奇特的联系，就象‘故事’与‘新编’之间，古文献叙述与重新叙述之间的异质与联系一样。这是《故事新编》具备全新的艺术形式和意味的前提。”文章强调鲁迅“对古文本的破坏性重述”，即“对古文献叙述的重新组合”，其目的也正在于要从这种“重新组合”的形式中发现鲁迅所寄寓的“文明的‘缘起’”“以至‘衰亡’的寓言”。由此出发，文章对《故事新编》中各篇小说都多少有了一些新的解释。例如，文章认为，《补天》中将“人神统一的神话转为人神隔漠：人神分裂，人背离神，人累死神的反神话”；《奔月》将“英雄故事倒转成了英雄末路的故事”；《铸剑》“在重述‘脊梁’们的行为中所添加的戏谑性话语”，“是反观‘脊梁’精神的

解体”，甚至是“对复仇精神的嘲弄”；《理水》的结局，是在说明“治水的意义则逆转为治人，所谓务实、变革天下，洪水滔天中力挽狂澜的意义和结果是秩序的重整，换来，太平到连面兽都会跳舞，的王朝盛世”；《非攻》与《铸剑》、《理水》一样，在小说结尾处出现了大转折和分裂，“小说的主干与结尾呈异质对立，结尾对主干产生破坏和否定”；《采薇》、《出关》、《起死》则更是鲁迅对古文献叙述的破坏性重述的杰作，分别揭示了王道准则的分解、尚柔学说和齐生死学说的困境。通过上述分析，文章得出这样的结论：《故事新编》“是处于文明末日时代的鲁迅重新审视文明起源时代的特点，从‘缘起’中看到‘衰亡’的必然，重述指向了文明的末日和精神的解体与颓败：神和超人英雄消亡，‘脊梁’们困顿不堪、没有意义或意义最终异化，哲人们没有任何救世或自救的能力”。“故事新编”都结束在小东西们的喧闹和卑琐行为上，理想精神的解体与小东西们鲜活伶俐，如鱼得水相联接。”文章还从“鲁迅的历史循环、古今相似的观念”去理解《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从“《故事新编》超越于古老寓言之处”肯定了鲁迅的“创造性价值”。这些都是很有新意的。

注重文本的层次性，力图从作品的表层结构中读解出“寓言”——“独特的意识结构”，这就必须善于发现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必须善于发现和界定寓体与寓意之间的关系，以及善于对寓意内容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且使这种解释又仍然是从文本自身出的。为此，在这批年青学者那里，对于文体形式的分析尤为注重，这是因为文本的层次性、文本的“意识结构”与表层的题材、体裁、形象之间的对应关系，都是由作者对作品的形式处理达到的。尤其是鲁迅的作品，他在形式上所下的功夫，他本人作为一个杰出的文体家，他的作品的“格式的特别”等等特点，使得对他作品的解读更须特别地关注其“形式意味”的把握，这是我们深入揭示出鲁迅所探讨的种种命题的重要途径。吴晓东的《鲁迅小说